

离当年梦想有多远

崔干行 著



这是一个人、一群人的历史

也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一段历史



南方日报出版社
NANFANG DAILY PRESS

离当年梦想有多远

崔干行
著



南方日报出版社
NANFANG DAILY PRESS
中国·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离当年梦想有多远 / 崔干行著. — 广州 : 南方日报出版社, 2015. 5

ISBN 978-7-5491-0933-3

I. ①离… II. ①崔… III. ①日记—作品集—中国—当代②书信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104156 号

LI DANGNIAN MENGXIANG YOU DUOYUAN

离当年梦想有多远

著 者：崔干行

出版发行：南方日报出版社

地 址：广州市广州大道中 289 号

责任编辑：刘志一

装帧设计：肖晓文

责任技编：王 兰

责任校对：阮昌汉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广东信源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889mm×1194mm 1/16

印 张：14.75

字 数：220 千字

版 次：2015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201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35.00 元

投稿热线：(020) 87373998-8503 读者热线：(020) 87373998-8502

网址：<http://www.nanfangdaily.com.cn/press> <http://www.southcn.com/ebook>

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前言 留下历史

摆放在读者面前的是一本历史书。

当然，也许你会说，不，这只是一本回忆录。

我不大喜欢“回忆录”的提法，因为“回忆”总是会受到生理和心理的影响，很难避免对内容的重新构建，从而使作品的价值打上折扣。而实际上，这本书尽管也有不少内容是通过“回忆”取得的，但主要的依据是史料。

第一章“九十九天”，主题“虔诚”与“毅力”，是依据我1966年从广州徒步（串联）99天到达北京的日记写成的。在日记中，我用具有“时代气息”的文字记录下沿途所见、所闻、所想。

第二章“血与火”，主题“叛逆”与“反思”，是依据我1968年主编的近15万字的《广州二中红卫兵大事记》写成的。广州二中（我高中时就读的学校）是干部子弟比较多的学校，我所记述的是一支以干部子弟为主体的反对“血统论”和反对武斗的红卫兵。

第三章“海南岁月”，主题“迷惘”与“责任”，收入我1968年代表35位红卫兵写给省市领导的上山下乡申请书。广州二中上百知青赴海南农场和北京中学55位知青首批赴云南西双版纳遥相呼应。在“后知青时代”一节，写的是我在中学和大学任职期间经历的若干件“大事”和“小事”。当然，记录下来的“事”都是有“意义”又有意思的。

第四章“家与国”，主题“磨难”与“希望”，内含我弟弟1974年在

农场九年后偷渡澳门和香港，到达目的地后写回来的第一封信，详述偷渡经过；以及广州三中（我初中时就读的学校）几位同班同学回忆当年因家庭成分问题导致考不上高中从而面临的困境。此外，还包含我舅父叶佩弦（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写的若干篇回忆20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在广东乡间生活的散文，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到我的外祖父（20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先后担任广东省新兴县、开平县县长）和外叔祖父（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任对外贸易部部长）之间看似奇特但又很正常的关系，也可以说这种“关系”体现出“不曾破裂的国共合作”。

是不是可以这样说呢，与共和国一起成长的一代人为实现梦想的曲折经历（包括肉体和心灵上的种种创伤），无论对他们自己还是对下一代都可能是一笔无形的财富。

把几十年前的事情写下来，目的只有一个，留下历史。为了尊重历史，在使用当年的日记、笔记、书信时，我都遵循一条原则：对文字只删不改。也就是说，把没有必要公之于众的内容删掉（人名用××代替），但绝对不改动，不增加。错别字或病句也原文照录，只是对影响阅读之处做了说明。标点符号倒是有小小改动，尽量规范（总得要为读者着想一下吧）。

亲爱的读者，当你有兴趣、有耐心读完这本书后，请你告诉我，我当年的梦想实现了吗？或者说，我离当年的梦想有多远？

前言 留下历史 / 001

第一章 九十九天 / 001

第一节 成了“人物” / 001

第二节 从广州走到韶山 / 004

第三节 从韶山走到北京 / 018

第四节 “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 / 061

第二章 血与火 / 068

第一节 写于1968年的“红卫兵大事记” / 068

第二节 “造反有理” / 072

第三节 “血统论”的肆虐与批判 / 090

第四节 “刀枪入库” / 103

第三章 海南岁月 / 121

第一节 “我们是希望” / 121

第二节 一个三县交界的地方 / 128

第三节 “英雄式”劳动 / 137

第四节 难为“无菜之炊” / 147

第五节 静悄悄地撤离 / 150

第六节 后知青时代 / 159

第四章 家与国 / 178

第一节 回到“旧社会” / 178

第二节 “走吧，记住要做一个好人” / 188

第三节 近在咫尺 / 195

第四节 不“清白”的家世 / 202

第五节 日子还得过下去 / 210

第六节 故乡：坝塘与水湄 / 217

后记 好事多磨 / 227

第一章 九十九天

第一节 成了“人物”

2001年9月，暑热未退，我带广州大学中文系十多位师范专业学生到广州市第七十九中学实习。七十九中是一所“麻雀学校”，但校园整洁，往南不远处就是珠江。

想不到竟然遇上一件麻烦事。

这天上午第三节，轮到女学生雯上课。铃声响了，雯还没有出现。有同学说，刚才看见她进了洗手间，但叫她也不回应。没办法，怕出意外，只得让一个女同学进去找她。但雯不肯进课堂。我们说了一些安慰的话，让同学送她回家，鼓励她明天再来上课。

到了第二天，快到上课时候，雯还是没有出现。打电话到雯家里，家里也很焦急，说她一早就出门了。我们派同学去找，看见她在车站旁边发呆。

第三天，我和另一位老师到雯家里。她躲在房间怎么也不肯出来。她的老父亲对我们说，雯读大一时体育不及格，心想反正都不能毕业了，所以也没有信心实习。

我们开导雯。又过了两天，勉强把她“扶”上了讲台。

雯是一个内秀的女孩子，她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情感意志出现了问题；而雨也是中文系的女学生，也挺文静的，她坦承自己有“心理障碍”。

如果按正常状态走过来，1999年雨就毕业了，但她没有这样“走”，大三时申请退学。我和她父母都觉得可惜。的确，雨学习比较吃力，好多门课亮红灯，但毕竟大三了，学的是文科，文字水平还挺不错。雨对我说：“没有办法，我就是走不进学校那道大门。一走近那道大门，我的头就痛得要死。”

真是“疑心多病症”。以后几年，这种尴尬事竟然一再出现。

2006年11月8日，《南方都市报》在《广州新闻·人物》版用将近两个版面登载了我40年前“徒步99天赴京串联”的“口述实录”，并刊登了我在南方都市报编辑部“重新戴上当年的东方红长征队袖章”的照片。之后，我的一位初中女同学打来电话：“你真应该给我们的孩子说说这段‘长征’，他们缺乏毅力，太脆弱了。”

我没有想到，“尘封”40年的那段历史还会引起这样的“效应”（所以说“尘封”，是因为我从来都没有在公众场合提过这件事）。的确，每一代人都有他们独特的精神气质和生活方式，我们的下一代生活在与我们完全不同的环境里，他们有他们的优点，也有他们的缺点。所以，我愿意再次话当年，和同辈及晚辈们共同分享我人生中那段经历。

当然，多年以后，我才知道，所谓缺乏“毅力”，所谓“脆弱”，有的其实是一种病态，那就不是简单的“说说”可以解决问题的了。

我和另外两位同学是1966年11月7日启程徒步“赴京串联”的。这时离“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标志性事件“五一六”通知发表将近6个月。当时，我们是广州市第二中学高二（4）班学生，在经历了对学校党支部、工作组“造反”，以及到社会“破四旧”这样的“革命活动”后，进入了大串联阶段。“大串联”主要在大中学生之间进行：到“兄弟学校”参观大字报，了解“革命造反”信息，并宣讲自己学校的经验，正如毛泽东主席1966年12月26日的一次谈话所说，“大串连使全国革命连成一片”（见《毛泽东年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而从“八一八”（1966年8月18日）开始，毛泽东主席已经连续六次接见“红卫兵”和“革命师生”，大家也就都把上北京接受伟大领袖检阅看作串联的一项重要任务，也是最大的荣誉和幸福。

但我们没有“资格”，因为我们的“出身”不是“红五类”。所谓“红五类”，“即家庭出身为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干部、革命军人和革命知识分子的子女”（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66—1976》，郑谦、张化著，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也有用“革命烈士”取代“革命知识分子”的。和“红五类”相对应的是“黑五类”。“黑五类”指的是家庭出身为

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和右派分子的子女。后来，不知不觉间，加上了资本家和“黑帮”，成了“黑七类”。再后来，又不知不觉间，去掉了资本家和“黑帮”，加上叛徒、特务、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知识分子，成了“黑九类”（这下子，该知道为什么“文革”期间有一段时间老师被称呼为“臭老九”了吧）。有兴趣的读者，不妨对“不知不觉间”做一点研究，弄清来龙去脉。

“上北京”有政策。中共中央、国务院1966年9月5日发出了一个《关于组织外地高等学校革命师生、中等学校革命学生代表和革命教职工代表来北京参观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通知》明确：“外地中等学校[包括全日制和半工（农）半读中等专业学校及普通中学]按每十名学生选出革命学生代表一人；教职工按每一百名学生选出革命教职工代表一人参加。”《通知》明确，“来京参观一律免费乘坐火车”，“到京后的伙食、住宿由北京市负责安排”。这里有两个硬件，一是十里挑一，二是“革命”。前者是比例，后者是标准。根据“比例”，我远未能达到这个“标准”。

一天晚上，我和同班同学翟广雄在广州二中礼堂聊天。广雄个子不高，文静，戴副深度近视眼镜。他望着窗外的夜空，感慨地说：“要能到北京多好啊！”

广州二中礼堂在教学楼三楼。我们班的课室就在礼堂靠右面。教学楼外侧是“在毛泽东旗帜下前进”九个大字。今天能见证岁月的不多了，只有枝叶繁密的大榕树，以及挂在树丫上那口铁钟。礼堂那座木地板舞台也在21世纪初“改头换面”，它曾经是红卫兵大辩论的“阵地”，20世纪90年代又上演过话剧《雷雨》。

我想起《人民日报》1966年10月22日发表的一篇题为《红卫兵不怕远征难》的社论。社论说“不坐火车汽车，徒步行军进行大串联，这又是一很有意义的创举”，“希望各地的革命学生，在自愿和可能的条件下，也这样做”。社论发表的背景是当时国内交通因为串联已拥挤不堪，而大连海运学院15名学生经历近一个月的艰辛，行程两千余里，到达北京。

我说：“我们也走路去吧。”

我的提议得到广雄赞同。那一年我19岁，广雄18岁。

过了两天，同班同学刘坚加入我们的队伍。刘坚身材轻巧，是篮球场活跃分子，他父亲是二中老师。正所谓“人以群分”，我们三个的“家庭成分”都属不红不“黑”一类，没有资格佩戴“红卫兵”袖章，也没有资格坐火车串联。

说走就走，我们到广东省人委外地革命师生接待站取了一张1966年11月制作的“徒步行军路线示意图”。这幅图南起广州，东达上海，西至成都，北到北京；上面还特别标出延安、井冈山、遵义、瑞金、韶山等“革命圣地”。图上描绘了从广州到北京的铁路路线。有一段毛泽东主席语录：“大风大浪也不可怕。人类社会就是从大风大浪中发展起来的。”还有毛泽东的七律诗《长征》，“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行装并不简单，每人背一个类似军队行军的背包，一个绿色军用水壶，好像还有一把小刀。路上都设有“接待站”，住的是大、中、小学因学生串联而空了的校舍，或各机关、团体腾出来的办公或储物的房间。一般没有床，只用一些稻草打地铺。一餐饭也就一角钱，但要交粮票。印象中，我母亲（姓叶名佩珊）前后给了我数十元路费用以“防身”。

除了另加说明，下面有关串联内容用上不同字体的都是出自当时写的日记。为了不造成阅读障碍，这些引文不再注明出处。不过，“广州到韶山”的记录，是“当时”写的，却不是“当日”写的。因为这一段内容是在韶山补写，用的是在韶山买的日记本。日记本封面枣红色，左上方由《毛泽东选集》和一支步枪组成图案，右下角是“民兵”两个字。扉页是一幅“首都民兵师”的阅兵照片，我在下方写上“1966年11月30日购于毛主席旧居韶山”。

第二节 从广州走到韶山

1966年11月7日。

今天我和朝东、刘坚同学组成长征队，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开始了步行革命串联，向韶山、北京进发。

早8:05从广州市立体交叉出发,约12时多到达江村接待站。约3时出发,5时多到花县接待站。共走32公里(22,10)。

今天是第一天,所以心情是比较兴奋的,看到一切都感到新奇。但是由于行军开始,所以还是比较累的。虽然这样,我们还是顶住了第一个考验——花县车站工人劝我们上车的“好意”。

朝东就是广雄。朝东是他的“文革专用名”。之所以说是“专用名”,是由于“文革”结束后,不少同学又把名字改回来了(据广雄后来讲,他这个名字没有“注册”,所以,我的日记可能是他的名字唯一一次被“正式”使用)。当时改名的同学不少,新名字一般都和“革命”有关,诸如卫东、反修、文革、红军。我倒没动过改名的念头,只是母亲见我的很多同学都改了,怕我也改一个“违背祖先意愿”的名字,于是对我说,你如果要改就把“行”字改为“衡”吧(粤语“步行”的“行”和“衡”同音)。不过我不为所动,觉得这样的“革命”毫无意义,也因此而没有了以后复名的麻烦。

“共走32公里”,一般一个小时走5公里。“(22,10)”表示上午走了22公里,下午走了10公里。这里的“上午”指午饭前,“下午”指午饭后的,不是标准的时间提法。

99篇日记中有20篇做了删节,共560个字。删节的内容包括四个方面。其一,“文化大革命”中的暴力语言。如“如果谁反对×××,就砸碎他的狗头”,“谁反对××××,谁就是反革命”,又如“把××老鳖打翻在地”(“老鳖”是某地对领导干部的一种侮辱性称呼)。其二,对某些长征队中某些事情的记叙和评论。如“今天看他开始认为乌龙泉没接待站时苦起脸,简直不愿走,而一知有饭吃,又兴奋”,本来是很正常的一种心态,但已经不清楚这个“他”是谁,又怕引起误会,也省略了。其三,没有必要公开的人名和事件。如“×××今天被红卫兵从广东揪回武汉了”。在大串联途中,这样的新闻司空见惯,也难免会写在日记上。有些人会采用半“公开”的略去方式,即用××表示。其四,有的文字表述不清,已没有办法“考证”。如评论某个有关“长征队”的建议时,认为“长征队应有一定人

数，三人确是困难”。这样的文字可以说是不知所云。此外，有的文字显得累赘，如“所以心情是比较兴奋的”，按照今天的写作习惯，我会写成“所以心情比较兴奋”，但出于尊重历史，也尊重当时的自己，就不改动了。

“串连”和“串联”的混写也不作统一。但有两种情况，则不得不改。其一，标点符号做了一些“手脚”，因为当时有不少用的是“实心号”（只是笔尖一点）；又如“8：05”也就是8点零5分，在日记上是写成“8.05”的。其二，有些不规范的“简体字”改了过来，如果不改过来，也就没办法排版、打印了。略去的人名、错别字及辨认不清的字，均在字或“××”后用括号加“注”说明。

记不得为什么要选择11月7日这一天。也许是纪念“俄国十月革命”吧。

这里说的“立体交叉”在广州越秀公园北面，是我国第一座城市道路立交桥。越秀公园有明代建筑镇海楼（五层楼）和中山纪念碑。顺着纪念碑前的百步梯南下，经过“孙中山读书治事处”，到达南门（南门正对中山纪念堂），再往东走大约百米，就是我们的二中了。

“车站”指的是火车站，“上车”是上火车。我们是沿着铁路走的，这样比较好认路。到北京的方式，既然出发前决定“徒步”，就不想反悔，所以拒绝了“好意”。

第一天走到的花县现在称花都，属广州一个区。花县是洪秀全故乡。当时的我们只能从课本上知道“太平天国是中国近代史上规模巨大的一次伟大的反封建反侵略的农民运动”，《天朝田亩制度》颁布的目的是想建立“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理想社会，而不可能知道洪秀全和太平天国的“另一面”。

接下来，我在回忆这段史实时列了很多数字，目的要说明我们是一个脚印到达目的地的。这样写可能很枯燥，但当时沿着铁路走，本来就很枯燥；再加上“教徒”朝圣，三步一拜，有闲心欣赏路上风景吗？

第二天是更艰苦的一天，要么26，要么41。我们选择了后者。累得很，脚起了泡，到接待站时简直不愿动了。这时思想斗争是激烈的，只要一动摇，就会成为逃兵。我们还是顶住这考验，相信前途是光明的。

中午约2时到银盏坳，晚上7时多到源潭接待站，共走41公里（26，15）。

脚上的“泡”很痛，用针把它挑破后，会有水渗出来，然后贴上胶布，几天后，伤口结成厚茧，就不再痛了。

源潭属清远县。这里最有名的是“清远鸡”。广州人“无鸡不成宴”（特别“心仪”的是渗着血丝的白斩鸡），但自从出现“禽流感”，对鸡的“感情”就相当复杂了。

一个大城市中学生，出行第一天就走了32公里，第二天走了41公里，除毅力外，和生活环境与习惯形成也有很大关系。拿我自己来说吧，七岁读小学前就在中国人民银行广东省分行托儿所全托。这个托儿所的性质也就是幼儿园。我母亲在这间银行上班。

当时的具体情境基本都记不得了。幸运的是我保留了一张很珍贵的照片（听母亲说是在街上小摊档买的）。我们七位同学（应该是八位，有一位没有进入镜头）围坐在一张桌子上吃早餐。每人面前一个瓷碗，内盛的应该是粥或牛奶，手上都拿着一块饼干。

倒是有一件事印象比较深，斯大林逝世时，老师和学生都戴上黑纱，默哀，汽笛长鸣。

托儿所坐落在广州东山梅花村，每逢周六有专车接我们回到地处长堤的省人民银行。

我读小学一、二年级也是寄宿，学校是位于西村的广州师范学校附属小学。校园环境很“野”，印象中有不少蓖麻树，树上结有红红绿绿带刺的果；青绿的草地上，出没着鲁莽的草蜢和略显妩媚的纺织娘。晚上，宿舍外面的草丛有一闪一闪的萤火虫。也是周六回家，周日下午回学校。我当时住在西关十八甫新街，离学校不算近。有一次下雨，我和住同一栋楼的一位比我高一级的女同学一起坐一辆人力三轮车回校。这种三轮车俗称荷包车，车靠背座上安有一个活动的半圆形的车篷，前面还有一块挡雨的帘子。

学校生活平静。有一天，我们到班主任罗老师的办公室玩。大家轮

流唱歌。我唱的是：“公鸡好汉子，大红的冠子，金黄的爪子，油亮的脖子。出来瞧一瞧，给你吃豆子。出来瞧一瞧，给你吃豆子。”唱歌时的角色应该是狡猾的狐狸吧。

还很清楚地记得一年级《语文》开头的几篇课文。第一课的题目是《开学》，课文就一句话：“开学了。”后面三篇课文也都只有一句话：“我们上学。”“学校里同学很多。”“老师教我们，我们要听老师的话。”都是大白话。

第3天，早上约8时出发，中午到旧横石，下午到黎洞接待站，只走34公里（23，11）。黎洞虽然简陋一些，但接待员是很热情的。

由于带的东西太多，所以我们在旧横石车站寄了一些回去。热情的列车员满足了我们的要求。

第4天，中午到波罗坑，晚上到英德接待站，共走35公里。

波罗坑接待站刚刚建立，所以中午吃饭是较困难的，但这已算不了什么，吃干粮，就睡在路边。

英德有我们当年十分崇敬的马口灭火英雄（和“马口灭火英雄”齐名的有广州市何济公制药厂的“救火女英雄”向秀丽，2009年她被中央宣传部等11个部门联合授予“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称号）。1960年2月26日，马口造纸厂失火，相邻的硫铁矿领导组织灭火。当时报道13人牺牲，其中党员7人，团员6人。45年后“追寻故事”时发现，当年还有3位解除劳教人员和3位正在劳教人员献出生命。消息读后令人唏嘘。

第5天，中午到冬瓜铺，晚上到沙口，共走35公里。

第6天，中午到乌石接待站，晚上到马坝，共走33公里。

日记很简短，大都是时间、地名和路程的罗列。没有多少具体的“事”，更没有多少“情”。每天实在太疲倦了，到了接待站，简单聊几句，倒头便睡。

第7天，早上走15公里到韶关市。到接待站时为10时多，分配到火柴厂。火柴厂的工人同志对我们十分热情，敲锣打鼓欢迎我们。

下午到市委补写了长征证明，因我们的证明本是校文革的。

对广东人来说，休整的第一件大事是冲凉。火柴厂的冲凉房男女通用，中间只是用若干木板隔开一个个小间。我隔壁是个女的，她大声地和另一边的一个男的说活。

中共韶关地委文化革命小组接待室给我们重新写了一个介绍函。这张“文革介字第4号”的“函”写着“兹介绍广州东方红战校崔干行等三位长征同学步行至韶山、北京，请沿途有关部门给予协助为荷”。直到今天我还保存着这张“千疮百孔”的文物。当我们说到这段“光荣”历史时，经常有人问，你们在路上到哪里吃饭？在哪里睡觉？看看“函”上面盖满的各地印章就清楚了：广东驻武汉接待站“借棉衣贰件，借绒裤壹条，胶鞋叁双，宣传费陆元，药费壹元伍角，补助钱陆元，借钱捌元，补粮票拾贰斤”；“语录证章在衡阳市已取”；“安阳市食宿已办”；“许织已发”；“保宿三人”；“北京站3人票已发”，日期是“67.2.16”。“许织”的“许”是许昌，“织”可能是纺织品；“保宿”的“保”是保定。

这里提及的“东方红战校”就是广州市二中的“文革”“专用名”。改名是当时冲击“资产阶级风俗习惯”的一项主要内容。在广州，“陶陶居”酒家改为“东风楼”，“上下九”改为“秀丽路”。1980年开始，这些店和路又陆续恢复旧名（也有没有“恢复”的，如现在的北京路“文革”前称“永汉路”），学校好像恢复得更早。其实，恢复旧名是轻而易举的，但要恢复一些良好的风俗习惯和礼仪就相当困难了，和破镜难圆是一样道理。

在韶关印象最深的还是在公园门前巧遇我父亲（姓崔名勇章）。他原来在广东省财政厅工作，“下放”韶关多年了。作为一个小知识分子，他有自知之明，事事谨小慎微。1965年9月，父亲被中国人民银行韶关专区支行授予“三等奖称号”，原因是“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

积极响应党的号召，认真学习，努力工作，克服困难，在一九六五年上半年完成了党交给的各项任务，取得优良成绩”。不过，他的荣誉也仅此而已。我后来到了海南，写信给他时还鼓励他“争取加入中国共产党”，真是好傻好天真。我记忆中父亲长年出差在外，最后一次到汕头，是中途用“专车”（救护车）接回广州医院做手术的。

在韶关见面之所以说“巧遇”，是因为当时通信设备不发达，父亲知道我们会经过韶关，但不清楚具体时间。

这是我第一次到韶关。1975年1月，韶关成了我离开海南的跳板，我以“照顾”父亲为理由到了韶关。这时才知道他住得多么逼仄。大概十平方米的单间，房间外狭窄的走廊一字儿摆放着各家各户的砂煲风炉，以及柴和煤。

第8天，参观了火柴厂，看了工人们的操作。

我们在韶关印了红臂章，把队命名为毛泽东思想东方红长征队。××是不愿步行到北京的。当然这不能怪他。他本来的目的地就只是韶山。但他决不能阻止我们北上，决不能拖后腿。

“××”指的是刘坚。实际上，刘坚要到韶山只是“个人行为”，根本不存在“阻止”和“拖后腿”。日记这样写，只不过表明自己要走到北京的决心罢了。广州当时不少徒步串联的长征队，目的地也都只是韶山和井冈山。

第9天，离开韶关，继续沿京广线北上。

中午到的接待站是不好的，有大字报批评他（注：“他”指接待站）。晚上到安口农场，共走40公里。

今天在韶关相遇的从化小红军长征队10人和我们又走到一起了，大家都很团结，决定了一起走。

在韶关结识的从化（中学）“小红军长征队”一行8男2女，目标是韶